

# 从士人出仕他国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观

李金亭

LI JINTING

学生编号：17093692g

指导老师

Prof. HAN Xiaorong

韩孝荣教授

MA in CHINESE CULTUR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18

## 摘要

本文主要以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出仕其出生国以外诸国的案例，来论述时人的华夏观。东周时期，由于打破了宗法制亲疏关系的限制，士阶层蓬勃兴起，士人游说出仕四方，离开自己的故乡国到他国谋取职位。这一双向选择的兴盛，显示了一个远超出各诸侯国的更大的整体范围观念的存在，即华夏观。士人只要还在「华夏」范围内出仕，便不算违背道义。从士人出仕他国可以看出，华夏观并不着重于地理界限与血缘族类，也并非不变的整体，它更趋近于一个文化版图，只要是接纳这种文化的国家或族群，都可以纳入到华夏的范围内。秦楚吴越招揽人才的兴盛，就意味着士人们早已认同这些原「蛮夷」国家的华夏化。血缘与地缘都不再是华夏观的核心要素，只有文化才是华夏的标签。

关键词：华夏观，士人出仕，文化观

## 致谢

首先，非常感谢我的导师韩孝荣教授的耐心指导，感谢他不厌其烦地为我指正论文中的不当之处。他视野开阔又见解独到的边疆课，也使我受益匪浅。感谢我的第二导师谢老师，感谢他指点我如何对比春秋战国的案例，并推荐了很多相关书目。感谢胡老师与黄老师带领我们入门文化研究，学习研究的方法、思路与论文的格式。还要感谢邢老师的画像石课、莫老师的诗词鉴赏课、陈老师的佛教课、梅老师的道教课、邓老师潘老师带的文化考察、以及理工大学与孔子学院举办的各类讲座。虽然没能选择在这些领域内撰写毕业论文，但是所有这些老师的讲授，让我深感做学问的严谨与深情。在中国文化学系上课是一种享受，那些初逢智慧的震撼与重读文学的感动，是忘不掉的。图书馆与学系工作人员的热情帮助，也让我感觉到了象牙塔的美好。

其次，非常幸运遇到我的同学们，和他们一起的时光是我觉得最有少年感的日子。与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们畅聊共同喜欢的文化，实乃人生乐事。我们也一起去听了许多场讲座，看了很多场戏曲、展览与节日的繁华。尤其要感谢梁兄、圣涵、姝廷、阿征、涵秋等同学对我写毕业论文的督促，我最终能及时交上论文，她们功不可没。在此愿我辈同窗，前程似锦。

最后，非常感谢家人朋友的理解、鼓励与支持，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的，都至关重要。

来日方长，无论以后能不能做学术研究，都不会遗失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一年多的中国文化研究生生涯，非常值得。

# 目录

一· 绪论 .....	6
(一) 选题缘由与意义 .....	6
(二) 研究现状 .....	7
(三) 研究方法与思路 .....	9
二· 背景阐述 .....	10
(一) 华夏观、国家观与民族观 .....	10
1. 何为华夏观 .....	10
2. 华夏观与西方国家观、民族观对比 .....	11
(二) 士人与其的代表性 .....	15
1. 士 .....	15
2. 士在春秋战国的地位 .....	17
三· 出仕他国实例列举与对比 .....	19
(一) 出仕他国案例 .....	19
1. 上层贵族 .....	19
2. 谋求机遇者 .....	21
3. 弘道者 .....	23
4. 被迫出国者 .....	27
(二) 留在本国的士人 .....	29
(三) 特例：蛮夷与周王室之人 .....	30
1. 由蛮夷之地出仕 .....	30
2. 进出周王室 .....	30
四· 对出仕他国的评价 .....	31
(一) 诸子百家的阐述 .....	31
(二) 后世史书、典籍编写者的评价 .....	32
(三) 诸侯国对比 .....	33
(四) 士人们选择的范围 .....	34
五· 春秋战国士人出仕别国的历史前后比较 .....	35
(一) 前溯：春秋的出奔 .....	35

(二) 从出奔到广泛的「游士」 .....	35
(三) 后世的对比 .....	36
六· 华夏观的分析 .....	38
(一) 何为华夏 .....	38
1. 姬姓为华夏? .....	38
2. 中原为华夏? 农业社会为华夏? .....	39
3. 夏王朝旧地、夏旧族为夏? 分封国为华夏? .....	40
4. 周礼的统治区域? 礼仪之邦为华夏? .....	41
(二) 华夏的边界 .....	42
1. 华夏与蛮夷戎狄 .....	42
2. 华夏与天下 .....	46
(三) 各诸侯国对整体性的认知 .....	48
1. 中原各国 .....	48
2. 蛮夷国家变成华夏国家后的自居 .....	51
七· 结论 .....	53
参考文献 .....	55

## 一·绪论

### (一) 选题缘由与意义

春秋战国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中国的大体轮廓——不论是疆域上还是思想上——都在这一时期渐渐酝酿成型并沿用千年。春秋战国是经历殷商和西周较为稳定社会以后的乱世，而这乱中又产生治。一方面周王室式微、诸侯崛起，产生多国林立互相征伐的局面；另一方面一种更广阔完整的大一统观念正在这种混乱局面中悄然形成，使得秦汉以后中国真正的大一统国家形态完全形成。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观，对纵观整个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后世的许多理念有着铺垫性的背景作用。

横向来看，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坐标。现今世界上对于国家、民族的研究已经渐趋完善，但因学者多为欧美背景，因此研究多以西方历史为主，尤以希腊城邦的国家意识起源为多。很多学者认为，古代并无民族，民族与其观念是近代才产生的事物。在这些研究中，都很少看到对中国春秋战国的研究。因此，研究与希腊城邦时期十分相似但又有本质不同、带有过渡性与无政府秩序的春秋战国时期，可以为国家观与民族观的研究做一个很好的补充。

而选取士人出仕他国的研究角度切入，则不仅是因为传世文献中记载春秋战国士人的记录较多，更因士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社会民意，从而在其言语与行为间展现一个春秋战国较为「公认」的华夏观。各诸侯国士人的广泛流动是春秋战国的主要特色之一，纵观中国历史，这几乎是士人最具独立人格、最为自由兴盛的时期。史书与典籍对华夏观念的直接记载更为抽象与理论化，且为了满足

政治的需要或当时的其他理想化功用（例如教育、说服功能等），未必能体现出当时的真正观念。且各诸侯国的典籍多已遗失，今天已经难以揣想。而士人出仕他国的案例则数不胜数，可以从多方史料中对比分析，认知与辨别当时对于「跨国」、「出国」究竟有何看法，是否为人们所接受，在多大程度、什么范围下为人们所接受，从而探究是否有一个超出了本国而又有一定边界的公认的华夏观念存在。

## （二）研究现状

对于东周时期士的研究，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与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较为权威。两本书都对「士」与「士大夫」的演变过程、历史地位予以探究。所不同的是，《士与中国文化》更偏重「士」，且都是放在中国背景下讨论，而《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则偏重于「士大夫」，且援引西方理论。二者互相补充，把由部落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含义演变、行为理念等阐述得十分清楚。

在华夏观方面，从地理角度，王明珂曾撰写《华夏边缘》，并在《英雄历史与弟兄民族》一书中的第二章〈英雄祖先历史与华夏意识初萌〉中也探讨了华夏与华夏边缘的出现，他的观点与传统解读很不相同，否定了某些「共同记忆」的真实性而指出其塑造性，提出「可从边缘认识核心」且逐一具体分析了华夏各边缘，并提出了族群认同的很多崭新视角。葛兆光著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二书，都是旨在重新界定中国、认识「中国」产生历史的著作。两本书对于

「华夏观」都有所阐述，且都主要是「文化观」上的阐述；从民族角度，徐杰舜著有《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他把「华夏族」作为汉民族的前身予以讨论，并以「雪球」的滚动扩大为喻，非常生动形象地解释了各族群如何逐渐融为一体。田继周《先秦民族史》的观念则更为中正，与传统华夏观更为相近；研究先秦历史的学者们也对华夏观多有研究讨论，如许倬云的《西周史》，利用考古学与传世文献的分析，非常详尽地论述了西周建立的过程与实行的政策，其中对周的分封与族姓关系、周与商及戎狄的关系有许多颠覆性的解读。邢义田在其《秦汉史论稿》的第一章〈天下一家——传统中国天下观的形成〉也非常详细而全面地对华夏观形成过程和范围做了阐述。李学勤的《春秋史与春秋文明》、《东周与秦代文明》多利用新的考古成果来追溯当时的历史与观念（用考古来追溯论证历史——而非传统史学的只参考传世文献——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今上古史研究的共性）；思想史类也多有学者提及这一领域，例如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与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但他们并未给「华夏观」做太多解说分析。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则集合了1957年学者们讨论汉民族形成与西方民族理论适用性的论文集。此外，李零的《我们的中国》系列书目，虽然属于文化随笔，但笔者认为其提出的很多解读更胜过许多专书与论文。例如其在系列第一本《茫茫禹迹》中详细阐述的周、秦之际的变革与文化大融合，以及春秋战国与其他古老文明的对比，就很有借鉴与启发意义；外国学者也有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制度观念与士人的论述，如宫崎市定的《宫崎市定中国史》，其思想与中国传统学者很不相同，但具有其独特的启发性。

相关学术论文的研究则更为细致而具体。讨论人才流动的论文有齐秀生的〈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流动述略〉。讨论游说拜官的有袁礼华的〈论春秋战国时期



的游说拜官)。讨论「俸禄」制度的改变对士人影响的有陈荣庆、龚艳芳的〈试论战国士人的俸禄变化与战国学术兴盛〉。讨论原「蛮夷国」华夏化的有李渊的〈《左传》中的楚庄王事迹与楚人的华夏认同意识〉(他着重阐述了从《左传》中所载的楚庄王事迹来看楚国贵族思想的「华夏化」过程)、梁葆莉的〈吴国华夏化的精神历程〉和〈春秋后期越国华夏化的精神历程及《左传》的「隐含叙述」〉;讨论「华夷之辨」相关主题的则数不胜数,其观点大抵相同,可以举秦永洲的〈春秋战国的华夷之辨与华夏正统之争〉为例,多是在讨论华夷的区别、华夏的优越意识。此外还有讨论华夏观与国家认同演变的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讨论华夷关系的陈筱芳〈春秋华夷关系以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讨论华夏观与中国疆域形成的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等。

由于「华夏观的形成演变」与「春秋战国士人流动」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以上研究情况的列举只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小部分。学者们在春秋战国士人的研究上已经十分完善,对华夏观也基本达成一致看法,但视角多是从周初分封与周对夏商的继承方面诠释华夏内涵。把春秋战国士人流动与华夏观结合起来讨论的则非常少见。

### (三) 研究方法思路

本文拟将重点放在出仕他国的士人案例上,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与比较研究法,通过对比分析史料(以《史记》《左传》《国语》及诸子百家为主)中的记载,用士人出仕故事逆推其深层的华夏观理念与背景。再结合当代学者们的解读,进

一步整合、联系，横向对比西方学者、纵向对比春秋战国前后的发展演变，来探讨春秋战国时的华夏观。

## 二·背景阐述

### (一) 华夏观、国家观与民族观

#### 1. 何为华夏观

华夏，是华夏族群的自称。《尚书正义》对「华夏」的解释是，「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sup>1</sup>田继周解释为夏具有大和中的意思，华则是源自服饰的特点。<sup>2</sup>「夏」与「雅」也往往相通。<sup>3</sup>通常来讲，华夏是和「蛮夷戎狄」对立存在的。李学勤认为：「华，即华夏族，亦称夏、诸夏，它是以上古的炎黄部落联盟为核心，逐渐融合许多不同来源的氏族部落集团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族体，是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sup>4</sup>

对于华夏观产生的时间，虽然华夏格局应在西周分封之初就已经基本定型，但王明珂认为，「华夏」这样有「共同起源信念」的群体，要到了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才在特殊背景下形成。<sup>5</sup>这样的推想不无道理，应该是在「礼崩乐坏」的混乱时期到来之后，一个强调整体的观念才应运而生。

华夏的地理范围，也应有其每一时期的相对界限，但这个界限因为不断变化，且并不十分清晰，显示出「弹性边界」与「模糊边界」的特征。总体来说，由春

---

<sup>1</sup> 孔安国，《尚书正义》（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 159。

<sup>2</sup> 田继周，《先秦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页 336。

<sup>3</sup> 葛兆光，《宅兹中国》（台北：联经出版社，2011），页 121。

<sup>4</sup> 李学勤，《春秋史与春秋文明》（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页 188。

<sup>5</sup>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国：中华书局，2009），页 38。

秋到战国，华夏的疆域逐渐扩大，从集中于黄河与长江流域之间，渐渐扩大到包括了今天中国版图东与南的大部分地区，仍缺少西与北的很多部分。

## 2. 华夏观与西方国家观、民族观对比

既然讨论的中心是华夏观，就不得不提到西方对国家观、民族观的论述。

西方的国家及民族历史与中国不同，他们往往是民族成分较简单的国家，对国家与民族的观念从其词语的定义上就可见一斑。英语 **nation** 一词既指代国家，又指代民族。而同时 **state** 一词也指国家。普遍来讲，**nation** 更包含民族色彩，而 **state** 则更强调领土主权。人们在 **nation** 之外还另外使用 **ethnic group** 一词来表示「民族」概念。而 **nationalism** 则更偏重于民族主义。这几个概念的区分也是学术界的一个复杂问题，由于本文的重点并不在此，因此只粗略比较这些近现代西方概念与华夏观的异同。

就民族观而言，在世界上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斯大林「民族」定义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sup>6</sup>按照斯大林的定义，这种民族概念当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种观点曾在中国学界掀起讨论，如《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中收集的学者讨论文章，学者们认为套用斯大林民族定义来界定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且趋于完善的汉民族，并不合理，汉族更非斯大林提出的由于资本主义瓦解封建制度而诞生的一部分近代民族。后期的学者也提出了更多方面的质疑。如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一书中指出：「我们知道共

---

<sup>6</sup> 历史研究编辑部，《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页6。

同的体质、语言、文化特征，并不是构成一个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也非构成他们的充分条件。譬如，以语言来说，世界上许多民族都不只说一种语言；相反的，说同样语言的，并不一定是同一民族」。<sup>7</sup>英国民族学家 Anthony D. Smith 也并不认同斯大林这种观点，并把他与 Benedict Anderson 的民族是「一个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且被想象为既有内在的局限性又有主权」的观点并列，<sup>8</sup>认为前者过于「客观」，失于狭隘，而后者则过于「主观」，失于宽泛。

Anthony D. Smith 将 Nationalism 粗略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将国家置于关切的中心，并想方设法促进其福祉」。<sup>9</sup>他提议将 nation 的概念定义为：「一个被命名的拥有共同神话、共同历史、共同公共文化、单一的经济以及所有成员的共同权利和义务的人类团体」。这一定义已经偏重于文化，然而依然有「单一经济」这一评判标准。而 ethnic 的概念他认为相应地可以定义为「一个被命名的与家园相连的人类团体，拥有共同的祖先神话、共享记忆、共享文化的一个或多个元素，以及至少在精英之间达成一定的团结」。<sup>10</sup>他也提出了 national identity（即国家认同）的定义：「不断复制和重新解释构成各国独特遗产的价值、象征、记忆、神话和传统的模式，以及对具有这种模式和遗产及其文化要素的个人的认同」。

11

Michael Ng-Quinn 将 nation 定义为一个「一个占据并拥有核心确定领土的主权的，有组织的、集中的、分层的核心群体」。他认为 Nationalism 是「对于国家的一种终极情感认同与终极忠诚」，对其（国内或跨国）民族的情感则是次

---

<sup>7</sup>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市：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页 10。

<sup>8</sup>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ism* (Malden,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1), p11.

<sup>9</sup>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ism*, p9.

<sup>10</sup>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ism*, p13.

<sup>11</sup>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ism*, p18.

于这种终极情感且不与这种情感相矛盾的。<sup>12</sup>他也指出「国家认同的最基本功能，就是在心理上统一人民，维系国家」。<sup>13</sup>他还提出：民族主义增强了其「国家具有独特性」的信念。<sup>14</sup>正如 Barbara Ward 所说，民族主义的本质是把别人排除在外」。

14

Anthony D. Smith 和 Michael Ng-Quinn 都是将国家观和民族观定义得更为细致具体的西方学者。虽然他们的定义依然不完全适合对中国民族的界定，但对国家认同与民族主义功能的阐述则已基本符合中国历史。

Michael Ng-Quinn 同时也对中国国家与民族观的形成做了详细阐述。他提及中国国家与特色的形成，是在夏商周时代。「三朝时期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中国民族认同模式：谁是中国？尽管中国内部存在着多样性，但它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具有核心文化，并将在文化兼容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进行不同的互动」。<sup>15</sup>

他还提出「当一个统一的周朝沦为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的内战制度时，基于统一和文化的中国传统民族身份并没有完全瓦解。尽管封建国家相互影响，仿佛获得了主权，但在名义上仍然承认周为象征、合法的中心。『尊王攘夷』依然是行为准则。另外，封建诸国并不把分裂看作是永久的，他们都想『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们各自以打败对方、恢复统一统治下的前周领土为目的，最终秦实现了统一统治。更重要的是，封建国家把文化作为一种标准，他们只把同等的国家视为平等。中国封建国家与野蛮人之间，既没有平等性，也没有合法的战争」。<sup>16</sup>

以上主要是华夏观与民族观的比较，而华夏观与国家观比较方面，就春秋战

---

<sup>12</sup>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5.

<sup>13</sup>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p32.

<sup>14</sup>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p38.

<sup>15</sup>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P43.

<sup>16</sup>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P44.

国时期华夏中的诸侯国的性质（是否为主权国家），学者们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战国的领土国家与春秋的都市国家之不同，在于前者有着明确的国境。」<sup>17</sup>「春秋时代，君主所支配的领域比较狭小，其政治也为传统所束缚，并且受到世袭贵族阶层的掣肘，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实施新政策。但到了战国，君主终于掌握了强大的主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自由施政。」<sup>18</sup>他认为战国与春秋时期相比，诸侯国的性质已发生转变。而中国学者则多持中庸态度，如桑东辉指出各诸侯国既非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也不是完全没有主权的附庸国。

19

其实西方学者们在各式各样的民族定义与解释中，所争论的核心只是民族的定义应该更客观还是更主观。像 Anthony D. Smith 的定义大概就是在斯大林的客观和 Benedict Anderson 的主观之间寻找平衡。而中国的华夏观与此相比，就更偏于主观。因为华夏观是主要强调共同记忆、神话、心理素质、信仰等的文化共通性，而非血缘、固定疆域、经济生活等的客观界限。从定义上来讲，华夏观似乎和强调主观的 ethnic group 更相近，然而就其政治性来讲，又包括 nation 一词的政治意识。

华夏观与西方的国家观、民族观是不同的。西方国家往往靠民族本身的凝聚力来塑造国家，然而中国则是多民族以文化为核心凝聚组成一个更大范围的整体——国家，并在国家范围内互相融合、形成新的民族。从传世文献或考古文物可知，商与周皆是如此，尤其周对商的征服与对疆土内人民的重新分配，使得夏商

---

<sup>17</sup> 宫崎市定著，焦堃、瞿柘如译，《宫崎市定中国史》（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页 79。

<sup>18</sup> 宫崎市定著，焦堃、瞿柘如译，《宫崎市定中国史》，页 81。

<sup>19</sup> 桑东辉，〈也谈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是否为主权国家——以《墨子》为例、以国际法为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页 137-149。

周及其他族群很大程度上打乱重组融为新的族群。<sup>20</sup>因此国家的轮廓即成为民族新的轮廓。西方的国家观与民族观很难适用于定义中国先秦的华夏观。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本身就是包含民族与国家含义的概念，是以周整个国家为单位形成的民族，可以说是汉族的前身。

## （二）春秋战国士人及其代表性

### 1. 士

「士」可谓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混合的称谓，正因为从古到今非常久远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广泛使用这个称谓，因此其指代的内容不断发生变化。有时在发展变化后其原意也依然在使用，造成了其许多相差悬殊的含义的并列存在。

阎步克在其《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一书中总结了前人对士的讨论，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士最初是指成年男子；后来进一步成为氏族正式男性成员之称，并区分为统治部族成员之称，成为了贵族阶级的统称；由于贵族担任官职，掌士者为士官，又成为了受命居官的贵族成员之称；由于贵族官员进一步具体化，士又成为了贵族官员中最低等级之称。<sup>21</sup>

士的最初含义是与「武士」相近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为首领效忠的军事成员，进而在城邑发展后成为有资格出战的公民，再发展为贵族。由武士到文士的转变，应是从西周才开始。顾颉刚有一篇〈武士与文士之蜕化〉，就专讲此事

士与「事」「仕」「学」都是有很大关联的，由于士从武士发展为文士，其生

---

<sup>20</sup> 见许倬云《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四章〈华夏国家的形成〉中的阐述，页126-158。

<sup>21</sup>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页29-56。

活内容也就变成了居官与学习两部分。他们成年（或到达一定年龄）后为官，而在此之前便以学习为生，是为「学士」。

而士成为贵族并具体化为贵族中的最低一层后，就成为了介于贵族与平民中间的阶层。上别于「王侯卿大夫」（但这些人依然统称为士），下别于庶民。士最初是有躬耕劳作的生活内容的，贵族与庶民区分开后，士便不事耕作，专拿俸禄了。<sup>22</sup> 而士又进一步发展，由原本「有职之人」发展成「士无定主」的状态，成为「游士」。<sup>23</sup>

同时士的门槛也在降低，一方面士在贵族中的地位不断下滑，另一方面庶民离士的距离却越来越近。庶民在此时可以通过学习、甚至只是因为通晓道理，便被任用，由农耕劳作者一举成为拿俸禄的官员。由庶民成为士，在春秋战国广泛的社会阶层流动中成为了可能。《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中章、胥己任，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sup>24</sup> 虽是夸张之词，但也代表了一定的潮流。再如赵简子伐郑时誓词中有「庶人工商遂」，杜预注「得遂进仕」，<sup>25</sup>可见庶人工商都有机会成为士人。可以说，士已经不再是以贵族血统划分的人群，而日益成为了一种可以靠后天努力获取的身份。

士与庶人逐渐并称，<sup>26</sup>「士民」一词出现，都反映出「士」由贵族底层，又发展为「四民之首」。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指出社会阶级流动，上层贵族下降而下层庶民上升，由于士阶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

---

<sup>22</sup>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页 44。

<sup>23</sup>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页 79。

<sup>24</sup> 韩非著，贾太宏译注，《韩非子通释》（北京：西苑出版社，2015），页 303。

<sup>25</sup> 杜预，李学勤等，《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注疏·卷第五十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册 7，页 1618-1619。

<sup>26</sup> 如左丘明著，陈桐生译，《国语·楚语下》（北京：中华书局，2014），页 352 中的「士、庶人不过其祖」。



所以士的人数随之大增<sup>27</sup>因此士在春秋战国时崛起，成为那个时代的一大阶层。

有趣的是，先秦的士与后世不同，并无如察举制、科举制等选拔制度下的官方对有才能者给予的认可，而似乎只是士人之间的互相承认与民间的一种认可。成为士的标准应至少是有才能、掌握一定学问。然而彼时的士阶层实际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例如齐孟尝君门下三千食客，听来似乎都是有才学的士人，但也不乏「鸡鸣狗盗」之徒。

## 2. 士在春秋战国的地位

士阶层崛起的大背景主要可以分为知识方面与政治经济方面。

知识方面，官学解体，学在四方。「王官之学」变为「百家之学」。原本只有周王室的臣子及各诸侯国中高级贵族才能接触到的知识，随着周官的四散、私学的兴起，而成为了普通人也可以接触的事物。

政治经济方面，井田制瓦解、宗法制打破、官僚制度改变、俸禄发放方式改变、旧贵族解体新士人产生、诸侯国的险境和争夺等都给士人带来了的机遇。经济与政治大背景的改变、俸禄发放方式的改变（由爵禄变为谷禄、由年禄变为月禄使得士人的机动性更大、流动更灵活），<sup>28</sup>战国诸侯国之间激烈的实力对抗与智谋较量，也使得其用人需求迅速增加、士的身价与机会迅速增长。各诸侯国不得不改变「尊尊亲亲」的固有模式，给其宗族外的贤人提供高官厚禄。这也正是士人可以出仕他国的原因。

---

<sup>27</sup>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页 10。

<sup>28</sup> 陈荣庆、龚艳芳，〈试论战国士人的俸禄变化与战国学术兴盛〉，《北方论丛》，2007 年第 2 期，页 72-75。

宫崎市定指出「(各诸侯国)即便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运用政治,也希望有可以依据的基本原理。于是,各国的王争着聘请通晓政治理论的学者以资顾问。结果朝廷变成了一种社交场所,国内外的学者聚集到此,互相论难,为推广自己的道而互相竞争。所谓『诸子百家』,就是对这些学者的总称」。<sup>29</sup>

士在此时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种类繁杂,无定主定官也无恒产的阶层。<sup>30</sup>此时的士,虽少了原本宗法制给予的固定的优越生活支持,但同时有了独立人格和自由选择的权利与机遇,他们的行为最能体现出观念与制度的变化。余英时指出「就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战国时代的士几乎没有不游的。他们不但轻去其乡,甚至宗国的观念也极为淡薄。其所以如此者正因为他们缺少宗族和田产两重羁绊。」<sup>31</sup>

但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史料中士人案例的代表力有限,即使是就士这一个阶层而言,史料所记载的也只是少部分士人。但从各种史料中对比分析流动于各国间的士人,依然可以得出一定的时代观念。基于士的代表力有限,本文得出的多数结论应是春秋战国时期「上层」的华夏观。

---

<sup>29</sup> 宫崎市定著,焦堃、瞿柘如译,《宫崎市定中国史》,页 81。

<sup>30</sup>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页 15。「士已不复如顾炎武所说的,『大抵皆有职之人』。相反地,士已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而进入了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却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着他们。」

<sup>31</sup>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页 52。

### 三·士人出仕他国实例列举与对比

#### (一) 出仕他国案例

春秋战国出仕他国的士人不胜枚举，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纵横家们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代表。苏秦张仪合纵连横带动各国风云变幻的故事，无疑是士人「跨国」的高潮。而更多搅动风云操控大局者，也多为出仕他国之人，如商鞅、公申巫臣、伍子胥，还有周游列国的孔子等人。

士的种类千差万别，钱穆、范文澜等都对此做过类别区分，本文由于列举的士人都是出国出仕的一类士人，因此在这一大类中为列举方便再分小类。简要分为上层贵族、谋求机遇者、弘道者与被迫出国者几类。这些类别并没有绝对清楚的界限，比如上层贵族也有学者（如韩非子）、谋求机遇者（如孟尝君）与被迫出国者（如信陵君），谋求机遇者中也不乏被迫出国者（如吴起等）和学者。虽然有交互，但这四类仍有其自身主要的特殊性。

#### 1. 上层贵族

各诸侯国的上层贵族，本是最不应该出国出仕的一批人，他们往往在本国功名利禄皆全。然而声名煊赫的战国四公子中，就有两位曾出仕他国。

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是魏昭王少子、魏安釐王的异母弟，礼贤下士，声誉极高，在魏国时诸侯不敢谋魏十余年。<sup>32</sup>他的「出国」主要是因为窃符救赵一事。为了救赵国于危难，在魏君不同意出兵的情况下，魏无忌假传君令杀死晋鄙并窃

---

<sup>32</sup> 司马迁，《史记·魏公子列传》（长沙：岳麓书社，2017），下册，页 522：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取兵符，发魏国援军击退秦国之围，享誉赵国，但同时也得罪了魏安釐王，因此暂居赵地不敢回国。信陵君窃符救赵，是出于亲族（姐姐嫁到赵国，平原君赵胜是其姐夫）、兄弟国道义、与自身名声的考虑。而事成后居于赵国，一则因他早就见疑于魏王，<sup>33</sup>二则因为窃符救赵这一突发情况，负了魏王而不敢归国。<sup>34</sup>最后他还是在魏国危亡之时回到魏国，率五国之军攻秦而胜，声震天下。魏王虽曾恼恨信陵君，然而为了国家的需要还是授予信陵君上将军印，但最终在离间下疏远了信陵君。

孟尝君是齐国宗室大臣，以养客三千闻名于世，其父为齐威王少子，在齐威王与齐宣王时历任要职，孟尝君在齐闵王时也任齐国宰相。后来他在齐国受到冷落，而秦国国君则厚利招他前去，先拜孟尝君为相，后因人谏言准备杀了他，孟尝君只得依靠手下食客「鸡鸣狗盗」狼狈逃回齐国，齐闵王仍以为相。

此外，韩非也是一个例子。韩非原是韩王之子，在韩国多次劝谏韩王无果，秦王闻其贤名召其入秦，而李斯和姚贾向秦王诽谤他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sup>35</sup>于是韩非便被囚禁并被李斯毒害。

在这三人的故事对比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出国对于贵族的危险性。孟尝君第一次准备入秦时，手下宾客皆阻拦而无果，苏代以「木偶人」与「土偶人」为喻劝说：「木偶人曰：『天雨，子将败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败则归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国也，而君欲往，如有

---

<sup>33</sup> 司马迁，《史记·魏公子列传》，下册，页 522：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sup>34</sup> 司马迁，《史记·魏公子列传》，下册，页 524：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也。

<sup>35</sup>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下册，页 448。

不得还，君得无为土偶人所笑乎？」，孟尝君才终于止步。<sup>36</sup>信陵君在秦攻魏时亦不敢归国，毛公、薛公两人往见公子劝谏道：「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信陵君听闻便急赶回国。<sup>37</sup>韩非子也终究因为「国别之疑」在秦国被害。

由此观之，对于贵族来说，出国仍是危险的选择，在本国发展总是有根基的，而出国则失去宗室的依托。宗室贵族与普通的士不同，如果诸侯国是家，那么孟尝君信陵君等人便属于家长层级，出了自家，虽在其他家谋到官职，却终究不能是同等的地位。此外，贵族在其他国家也更容易受到怀疑。如韩非在秦国出谋划策，李斯便以韩非实际是为了韩国利益向秦王谗毁他。虽然时代已经发生变化，贵族世袭制已经逐渐向官僚体制转变，但血缘势力此时依旧是重要的根基，因此上层贵族少有长久留在其他国家的。

## 2. 谋求机遇者

谋求机遇者是出国士人中的绝大部分。由于环境变得更宽松自由，机会也骤增，他们为了有更好的出仕机会，往往选择政策更好的诸侯国。而「出国」已经成为很普遍的行为，人才在各国间的流动几乎已不受任何阻碍。

春秋战国的市场已经成为了士人一方的市场，各国间对人才的争夺与国力较

---

<sup>36</sup> 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下册，页 512：秦昭王闻其贤，乃先使泾阳君为质於齐，以求见孟尝君。孟尝君将入秦，宾客莫欲其行，谏，不听。苏代谓曰：「今旦代从外来，见木偶人与土偶人相与语。木偶人曰：『天雨，子将败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败则归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国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还，君得无为土偶人所笑乎？」孟尝君乃止。

<sup>37</sup> 司马迁，《史记·魏公子列传》，下册，页 525。

量直接相关。齐宣王与颜觸有过一段关于「王贵」还是「士贵」的精彩辩论，而结果必然是颜觸的「士贵」获胜。他提出王纵然拥有权势，但只有依靠贤士的辅佐才能成功。<sup>38</sup>同样，魏国的田子方也有过这样一段言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sup>39</sup>各诸侯国都在此时给出优厚条件争夺人才，如齐国从姜太公起便奉行「举贤尚功」的政策，<sup>40</sup>《管子》中也记载有君主应如何向天下招揽人才。燕昭王则「卑身厚币」以招贤。晋国秦国也使用各种手段招纳他国贤士。同时，为了保住本国人才，诸侯国君们也要摆出最宽容、礼待的姿态。最利于士人在各国「谋职」的时代由此产生。

我们知道的大部分春秋战国名士，都是这一类的士人。比如李斯、甘茂、吴起、苏秦、商鞅、惠施等等。

惠施是宋国人，却在魏国为相，为魏国外交出访、制订法律，且合纵抗秦。苏武是齐国人，却主要辅佐吴王。吴起是卫国人，后在鲁国为将，大败齐国，被免后又投奔魏国，改革魏国兵制并多次大败秦军，后又投奔楚国，官至令尹，大兴改革，扩大楚国疆域，并与赵国联合大败魏君。甘茂是下蔡人，原为秦国左丞相，遭谗毁奔于齐任上卿，而又使于楚，卒于魏国。苏秦则周游列国，以燕为基地，在赵国佩六国相印，合纵抗秦。张仪原是魏国人，与苏秦同门，在苏秦发迹时投奔赵国，被苏秦刻意羞辱，怒而入秦国成为客卿，主持「连横」，游说诸国，回到魏国后让魏国臣事秦国，卒于魏。商鞅是卫国人，先在魏国国相手下任职，

---

<sup>38</sup> 刘向校定，王扶汉、孟明译，《文白对照全译战国策》，页 284-286。

<sup>39</sup>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册 1，页 19。

<sup>40</sup> 时海静，《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国人才研究》。湖北：华中师范大学，2011。

后来又秦国变法，使秦国空前强大。李斯本是楚国人，入秦国为相，并曾作《谏逐客书》，列举秦国历代国君使用客卿壮大自身的例子。

他们在哪个诸侯国时，便会为其新国君考虑，而基本不会顾虑自己从前任职过的国家或故乡国。如吴起为楚攻魏，商鞅为秦伐魏。张仪则更甚，回到魏国之后，依然为秦国的利益，使用各种办法劝说魏君退出合纵、臣事秦国，甚至不惜暗中让秦国攻打魏国。群臣因此向秦武王谗毁张仪：「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到了纵横家时期，士人就如下棋一般，已经基本没有了道义的站位考虑，只寻找自己最有力的依托、最得力的局面，摆布诸国如棋子。

当然，还有豫让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类型的士人。<sup>41</sup>他并不是致力于一个国家或一个主人，但一旦遇到对自己「国士以待」的主人，便要舍身报之，再不易主，甚至要拼死为其报仇。但这一类人还是更应当算作「刺客」，「刺客」的特点是只讲与主人之间的道义，而没有更大的社会、国家道义等大局的考量，即没有独立的判断。这一类士人的理念与最初的「武士」更为相似，不符合本文所列举的代表春秋战国社会民意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士人标准。

### 3.弘道者

春秋战国时期弘道者以学者为主（即今所谓「诸子百家」），但并非全部学者都符合，也不是仅限于学者。弘道之士与谋求机遇之士的最大不同即在于，弘道者们相信「士志于道」，而不为名利。他们并不为更好的机遇、待遇决定去留，而是以君王的礼待与道义作为基准。甚至有人终身不仕，只为行其道。这就以鲁

---

<sup>41</sup> 刘向校定，王扶汉、孟明译，《文白对照全译战国策》（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页452。

仲连最有代表性。《史记》载「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sup>42</sup>对比前文所列的诸位士人，就可以见其明显的区别。

孔子是春秋战国学者中最典型的一位了。他是宋国公室之后，为殷商后人，但他生长于鲁国，非常认同并推崇周礼。《史记》中总结他的出国历程，是「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sup>43</sup>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他周游列国，四处推行他的理论和执政方略，「干七十余君」，终无所遇。他的关注点落在周、周礼上，他是想要恢复西周「大一统」的，因此并不在意各诸侯国间的差别——总之他们都是在周统治内、周礼范围内。各诸侯只是「家」，只有周才是国，因此，孔子的理念不论在哪里实行，都不算超出这个范围。《左传》中还记载有孔子「良禽择木而栖」的观念，孔子感叹「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sup>44</sup>可见其视士的去留择君为很正当的事情。同时孔子在各国也是积极寻求机遇、想要从政实践其理论的。

当然孔子对出生地鲁国是报有很高期待的，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邑，也是他理想实现的最适宜之处。可他在鲁国已经无法再立足。孔子对楚也是认可的，如楚昭王不肯以将相与河移己之祸，「孔子在陈，闻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sup>45</sup>说明他的认同范围也没有局限在中原。事实上，孔子是春秋战国史料中少见的、怀有以夏变夷观念而真正对去往蛮夷国家抱有使命感和热忱的人，如果不是令尹子西劝阻楚昭王，孔子很可能在楚国出仕。

---

<sup>42</sup> 司马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下册，页 554-557。

<sup>43</sup>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上册，页 367。

<sup>44</sup> 左丘明著，陈书良审定，《春秋左传》，页 862。

<sup>45</sup>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上册，页 301。



孔子的教学提倡「有教无类」，追随孔子的学生们来自不同诸侯国，如子贡、子夏来自卫国，公冶长来自齐国，颛孙师来自陈国，秦祖来自秦国，司马耕来自宋国，任不齐来自楚国。后来也去往不同诸侯国任职，如子路做了卫蒲宰、高柴做了卫之士师，子贡为卫信阳令，宰予做了齐国临淄大夫。可见在孔子时，私学的兴办已经使「出国游学」成为一种兴盛的行为，后来的「西河设教」、「稷下学宫」也是如此。既可以出国而学，更可以出国而仕。除子贡是回到故国任职外，多数学生也是去国谋职。许多来自其他诸侯国的学生也在孔子当政时期成为了鲁国的官员。「游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仕」的敲门砖。

儒家应是弘道意识最重的一个学派。《论语·泰伯篇》中曾子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便是儒家对士人寄予的厚望。<sup>46</sup>在孔子之后，儒家学者仍保持周游列国游说传道的方 式，例如子夏，本是卫国人，曾在鲁国任太宰，孔子死后他 去往魏国讲学，即著名的「西河设教」，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学生，如李克、吴起、田子方、李悝、段干木、公羊高等。魏文侯也尊他为师。

孟轲即孟子，原是邹国人，到齐国、宋国、滕国、魏国、鲁国推行政治主张，但也像孔子一样不被接受。他和孔子都是周游列国多年，最后回到家乡著书立说。在去留问题上，孟子提出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sup>47</sup>「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sup>48</sup>「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sup>49</sup>是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去留观。

---

<sup>46</sup> 孔子著，杨伯峻、杨逢彬注译，《论语·泰伯》（长沙市：岳麓书社，2000），页 72。

<sup>47</sup> 孟子著，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孟子·万章章句下》（长沙：岳麓书社，2000），页 187。

<sup>48</sup> 孟子著，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孟子·离娄章句下》，页 136。

<sup>49</sup> 孟子著，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孟子·离娄章句下》，页 137。

荀卿即荀子，原是赵国人，游学齐国，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也曾入秦，称秦国「治之至也」，最后为楚兰陵令。荀子不仅传道与整理典籍，也为官执政。他培养出的学生李斯、韩非、张苍等，从他那里学到了帝王之术，又发展出了法家思想。

墨子则更为特殊。他虽早年学于儒门，但渐渐不满儒家学说，便自创墨家学派，不主张周礼式的等级观念，而提倡平等节用兼爱，是一种更广阔平均的天下观。墨子的出生国说法不一，有说宋国，有说鲁阳，还有说滕国。而他与弟子们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往往是为了制止大国对小国的「不义」的战争，如制止楚攻宋等。

孟子的「道尊于势」，荀子的「从道不从君」理念，都说明了士的去留是不以君主为限制的。墨子的士人去留理论与弘道的观念与儒家也相去不远。儒与墨的「使命感」都很强。他们为了自己心中的道义、政治理念去寻找实践的平台，而并非栖身于利益、受制于强权。这是学者理念上与普通士人最不同之处。但也鲜有学者能真正做到。

值得一提的是，儒家这种「士志于道」的观念，到李斯时已所剩无几。李斯作为荀子的学生，也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但显然功利性已经完全盖过了道义的重要性（也可以说功利性正是法家的道），他向荀子辞别时说「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sup>50</sup> 这一言语的真假且不论，然而李斯之时士人的所作所为，确已非「为道」，这也许与战国后期国家数量减少、没落贵族即士人迅速增多而机会

---

<sup>50</sup> 见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下册，页 577。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 477 中提到钱穆疑李斯辞荀卿之言太卑鄙，或为卑鄙者所假造。但不管是否出于李斯之口，这段话都反映了当时游士的处境和心理状态。

相对较少，「寒士」们贫困难求生计有关。

邹衍是阴阳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原本是齐国人，就学于稷下学宫，但齐闵王时国家昏乱，恰逢燕昭王招贤纳士，邹衍便离齐入燕。后来燕与五国联合伐齐，邹衍并未参与，燕惠王继位后不信任邹衍，甚至把他投入狱中，遭逢变故的邹衍最后在齐国稷下学宫重新兴盛的背景下回到了齐国。邹衍是把学问应用到职位上发展生产的学者，因此与其他学者以推广政治理念为主并不相同，而他对自己的国家显然是极有感情的。

稷下学宫的诸位「先生」与「学士」也算是一类特殊人群，<sup>51</sup>他们以纯「学者」的身份存在，并不真的入职或出仕，并不算君王的正式臣子。然而他们却可以「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sup>52</sup>以议论和教学为业，留于齐国。除储备人才的需求外，齐国君主厚待这些士人也许并不全为实际的国家发展需求，而更是为了宣扬自己「重道」、「有道」，从而达到某种政治效果。

#### 4.被迫出国者

出国出仕之人，其动机应当都是「引力」与「推力」的结合。既有要去往国的吸引力，也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来自其故国的推力，比如缺少机会、被邻里嘲笑、犯过法、无故蒙冤、家人被杀、被诬陷等等。否则，多数人都会选择留在父母之乡发展，毕竟这是更熟悉的地方，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也是家人所在。这些被迫出国的士人中比较典型的，多是有性命之忧或杀父之仇的较极端的例子。这些人

---

<sup>51</sup>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页 39。引《先秦诸子系年》中「游稷下者称学士，其前辈称先生」的论述。

<sup>52</sup> 桓宽，《盐铁论·论儒》（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页 24。

出国后对原国的行为也更为激烈，多是复仇。

吴越之地，向来是「蛮夷」之地，与中原鲜有来往，而第一批去往吴越、使得吴越骤然崛起的，都是一些来自楚国的「复仇者」。

首先便是公申巫臣，他本是楚国大夫，楚庄王破了陈国后得到夏姬，楚庄王与其弟子反都想得到夏姬，公申巫臣劝说他们放弃后自己设计得到了夏姬，子重、子反遂诛灭巫臣全家并分其家产，公申巫臣从此与楚结仇。他投奔晋国建议晋国联合吴国，夹击楚国，并亲自到吴国，教吴国人驾驶战车。吴国从此崛起，甚至在战争中胜了楚国，楚国则受到抑制。

伍子胥是楚大夫伍奢之子，因为一桩楚平王夺太子聘女的闹剧、在费无极的谗言下，太子太傅伍奢与其长子伍尚都无辜被杀，伍子胥则逃入吴国，帮助阖闾上位并成为其重臣，最终带兵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吴国在伍子胥等人的辅佐下，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齐国人孙臧与庞涓为同窗，在魏国任职时受到庞涓诬陷，被施以臧刑，在齐国使者帮助下逃回齐国，辅佐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并帮助齐威王成就一代霸业。

乐毅家族则是遭遇反间的代表。乐毅出生于被赵国吞并的中山，相当于生在赵国，原本是燕国上将军，辅佐燕昭王复兴燕国，统帅五国联军几乎攻下整个齐国，为燕昭王报了齐国当年攻燕之仇，但随即遭齐国反间，受到新任君主燕惠王的猜忌，只得投奔赵国。他的儿子乐间也几乎是同样的经历，从燕国投奔赵国。

范雎原是魏国中大夫须贾门客，因被怀疑通齐卖魏，差点被魏相国魏齐鞭笞致死，最后逃往秦国，向秦昭王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成为秦国宰相。他最后也羞辱了须贾并迫使魏齐自杀。

楼缓原是赵国人，为赵武灵王手下重臣，支持其推行胡服骑射，并致力于建立赵秦友好关系。后赵武灵王去世后，惠文王年幼，奉阳君李兑实际主政，使机郝入秦以免楼缓。楼缓失去相位后投奔秦国，从此损害赵国，及至长平之战后，还到赵国劝赵孝成王割地求和，被虞卿阻止。

这些被迫出国并有复仇之心的士人，有能力者往往能迅速壮大投奔国，以打击自己故国。从记述中并未看出时人认为这是「叛国」的观念，都只以正当「复仇」视之。

## （二）留在本国的士人

士人的第一选择还是在本国从事，如果不成，才另谋他国。许多名臣如齐国的管仲、邹忌和晏子，楚国的孙叔敖，郑国的子产，卫国的蘧伯玉，赵国的平原君等，都是终其一生在自己出生国为官。

但仕途不顺甚至寸步难行时，依然坚守在本国，就是一种特殊现象了。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楚国的屈原和鲁国的柳下惠。

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原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股肱之臣，因同僚的陷害诽谤而被楚怀王疏远、罢黜。屈原眼见楚怀王中张仪计、楚怀王留秦不反，楚国被合攻，而楚顷襄王与令尹子兰又流放屈原，屈原抑郁不平，写下众多楚辞后投汨罗江自尽。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的结尾都曾感叹说「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sup>53</sup>说明那时本国仕途不顺则去往他国的情形已经非常普遍，而屈原的坚守反而让人

---

<sup>53</sup>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下册，页 565。

唏嘘。

而柳下惠，《论语·微子》中有「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sup>54</sup>也是同样，「不去父母之邦」的柳下惠已为时人称奇。

这两个坚守者都成为了后世的道德典范，而这正说明，那时的大潮流已经是在诸国间随意奔走，谋求更好的机遇，枉顾「父母之邦」了。

### （三）特例：蛮夷与周王室之人

#### 1. 由蛮夷之地出仕

由余大概是唯一一个史料记载中从戎狄被「挖来」的人才了。但由余虽是戎王的臣子，也是中原人的后裔，据传他是晋鄂侯的曾孙，也是姬姓贵族一脉，因曲沃武王伐晋流亡到了戎地，会说晋国语。戎王派由余到秦国考察，他向秦穆公讲论戎夷何以为治，竟胜过中原士人，秦穆公爱其才而未能劝说由余留下，最后还是内史廖设计送女乐给戎王，使戎王耽于酒色不听劝谏，由余只好归秦，秦穆公拜其为上卿。由余为秦穆公出谋划策，帮助秦国攻伐西戎，并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使秦穆公位列春秋五霸之一。<sup>55</sup>

#### 2. 进出周王室

从周王室「逃入」各诸侯国的士人多，士人投奔周王室的则鲜少听闻。只有

---

<sup>54</sup> 孔子著，杨伯峻、杨逢彬注译，《论语·微子》，页 175。

<sup>55</sup> 事见《韩非子·十过》。韩非著、贾太宏译注，《韩非子通释》，页 65-67。

少数如百里奚曾奔周「遂之周。周王子穰好牛，臣以养牛干之。」<sup>56</sup>与苾弘以方术事周王这样的片段记载，<sup>57</sup>以及老子从楚国去往周作「守藏室之史」的简要记载（但老子的身世一直争论未定，说老子是楚人只是其中一种说法）。还有一些是访问、朝见，如孔子的拜访周室、晋国韩起聘于周等。从周王室流散到各诸侯国的士人显然更多。《论语·微子》中有：「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sup>58</sup>这也许是因为周王室渐趋衰落，供给士的机遇不如各诸侯国，以及名义上周王室的官员等级应高于诸侯国，对于士人来说存在身份上的差距等的原因。

#### 四·对出仕他国的评价

##### （一）诸子百家的阐述

诸子百家对士人出国的记述，尤以儒家为多。孔子有很多以夏变夷与出仕他国的论述，如「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sup>59</sup>他及弟子们也多于各国任职。儒家还先后编有《礼记》、《春秋公羊传》等被奉为「正统观念」的典籍，对这些观念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解读。

孔子在《论语》中常和他的弟子们论及去哪国执政、怎样执政，显然各诸侯国都是他们可以实行治国理念、政治主张的平台，而并无分别。《礼记》中还提供了士人出国的「礼仪依据」。即「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

---

<sup>56</sup>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上册，页 39。

<sup>57</sup>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上册，页 192。

<sup>58</sup> 孔子著，杨伯峻、杨逢彬注译，《论语·微子》，页 179。

<sup>59</sup> 孔子著，杨伯峻、杨逢彬注译，《论语·微子》，页 157。

<sup>60</sup>如曹国曹羈三谏而曹伯不听，便出奔陈国，孔子认为这样符合君臣道义。

到了孟子、墨子时期，似乎已基本淡化了原来的「宗国」「同姓国」与「华夷」的概念，而只有大国小国、强国弱国。秦楚齐晋即强国，而宋国等为小国。如《孟子·滕文公下》中对于宋国欲行王政，孟子指出「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sup>61</sup>齐楚并称，举为大国之例，并未以正统与否区分。在诸夏范围内，则如前文所述，孟子对士人的去留与择君判断都以道义为核心标准，并不提倡盲目忠于一国一君。

墨子还指出一种更大视角中的平等「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sup>62</sup>而非周王周礼的天下。且「想要一国治理得当，则招天下贤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理念，其著述中的〈尚贤〉一整篇几乎都在讨论此事，如「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sup>63</sup>

《韩非子》中则大量列举士人们的故事以阐述道理、议论时政，其中也多有士人各国间流动之事。到战国时，由于士人去往他国的行为已经太过普遍，因此人们已经不再对这种行为有什么特别评论了。

## （二）后世史书、典籍编写者的评价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应是支持这种「出国」的。他对苏秦和张仪的光辉人

---

<sup>60</sup> 丁鼎，《礼记解读》，页 59。

<sup>61</sup> 孟子著，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孟子·滕文公章句下》，页 105。

<sup>62</sup> 墨子著，孙以楷、甄长松译注，《墨子全译》（成都：巴蜀书社，2000），页 270。

<sup>63</sup> 墨子著，孙以楷、甄长松译注，《墨子全译》，页 281。



生的描述，就显现出了某种认可。在〈屈原贾生列传〉的结尾对屈原不出国的遗憾慨叹，更说明出仕他国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西汉刘向的《说苑》一书也多记载春秋战国时人才流动与大国人才引进之事，（尤以翟黄与季成子引进人才为典型），<sup>64</sup>作为明君贤臣的范例。

东汉王充所著《论衡》亦多记载此类事，其中〈效力〉篇中提出「吴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两主不能举也。举物不胜，委地而去可也，时或恚怒，斧斫破败，此则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此篇中还有著名的「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sup>65</sup>可见，后世的记载者也多将春秋战国时期人才在诸侯国之间的流动看做合理且有益之事。

### （三）出仕国对比

相比来讲，秦楚齐晋（包括后来的韩赵魏）等强国与前期文化昌盛的鲁国，都是士人最常选择出仕的国家。总体来说，新兴国的空缺多、需求多、潜力大。传统的强国大国则实力强、待遇优厚，对士人的吸引力都很大；而鲁国则有双面性，一方面鲁国礼法文化强盛、农业社会生活较为富足，对有才之人与别国贵族会以礼相待，另一方面其保守性与阶层稳定性也更大，二者相抵，对士人的吸引力反而不如前几个国家。

招纳贤士以秦国最为典型。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得最清楚：「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

---

<sup>64</sup> 刘向著，汤以澂校，《说苑·臣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册1，页13-21。

<sup>65</sup> 王充著，《论衡·效力》（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页204。

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sup>66</sup>可谓每代君王都得益于外来贤臣。

秦国对士人也多破格录用、因功录用，且持久招纳人才，其身居要职的引进人才数量远远多于本国人才。且秦国不仅重视人才引进，监督评价机制也很发达，使得任用士人的素质始终得到保证。这些都是其他诸侯国难以企及的。<sup>67</sup>

#### （四）士人们选择的范围

从春秋到战国，士人们不再以姬姓国与中原国为选择的核心标准，而主要看重投奔国君主或公子纳贤的政策。

从数量来看，士人出仕选择的诸侯国基本在中原范围内，少入「蛮夷之地」。如《韩非子·说林下》中记载了一则由于公孙弘断发而为越王骑，其兄公孙喜便与之绝交的故事，<sup>68</sup>说明此时中原士人还以去往越国蛮地为耻。但春秋吴越楚兴盛与战国后期秦国大举招纳人才时期，则大批士人涌向周边。春秋时，秦楚吴越已经在中原核心与边缘蛮夷的过渡地带，随着时间发展它们逐渐成为中原文化圈的一部分，使得这个可以出仕的范围版图大大增加。但仍有一部分「蛮戎夷狄」与中原文化相差较大，自始至终少和中原往来，如北狄和西戎。只有一个由余是特

---

<sup>66</sup>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国：线装书局，2006），页 374。

<sup>67</sup> 孙赫，〈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人才引进〉。吉林：吉林大学，2011。

<sup>68</sup> 韩非著，贾太宏译注，《韩非子通释》，页 204。

例，但由余也是中原流放戎地者的后裔。

## 五·春秋战国士人出仕别国的历史前后比较

### （一）前溯：春秋的出奔

「出奔」大概可以说是春秋战国人才广泛流动的前身了。但出奔相比而言更为严肃、悲切。据徐杰令〈论春秋时期的「出奔」〉一文的论述，春秋时的出奔尚属关系重大的事情，出奔者不仅在出国前要去祖庙（或哭墓）以告列祖列宗、国境线上要着素向国而哭，投奔的诸侯国如果与其原诸侯国有聘使往来，也要行告诉之礼。且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出奔者大多几年后便能返回故国，其故国也有责任保留他的田产三年。<sup>69</sup>

可见，与后期游士相比，出奔行为是暂时的，出奔者更为被动，其中很大比例仍会回到原国。

### （二）从出奔到广泛的「游士」

从春秋到战国，国家观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由于战争等因素，诸侯国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分明，另一方面，频繁的交流却在观念上进一步打破了这种界限。出国已经日益变为一种合理化、普遍性行为。士人们不再拘泥于自己的国家，而是有一个更大范围的合理性区域可以选择。

由于贵族制度的逐渐瓦解，血缘关系也逐渐淡化，国别不再重要。到了战国

---

<sup>69</sup> 徐杰令，〈论春秋时期的「出奔」〉，《史学集刊》，2000年第2期，页76-81。

时期，四公子门下皆有三千食客，稷下学宫的师生数量也蔚为壮观，这些人都来自四方各国，可见此时游士之众。

### （三）后世的对比

东周往后的后世多为大一统国家，即使出现如魏晋南北朝与五代十国的乱世，效忠本国或本朝的观念也已经形成，国家观念变得更加狭隘而稳定。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环境，都使士人们不再自由流动。

在与春秋战国相距不远的西汉初，曾有与战国类似的「游士」风气出现。此时「游士」存在的前提，正是汉初恢复了周的封建制度，使得与中央可以分庭抗礼的诸多「诸侯国」再次出现。有许多士放弃中央官职，转而到各诸侯国任职。

《汉书·贾邹枚路列传》中邹阳与严忌、枚乘等先俱仕吴，后因故去吴，从梁王游；主父偃的「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sup>70</sup>与战国时的游士何其相似。当在中央谋官艰难（如军功集团占有大部分官职，选拔人才机制不完善），<sup>71</sup>诸侯各国权力又很大时，士（主要是儒士们）便纷纷游于诸侯国，吴王刘濞与淮南王刘安的招贤纳士广揽人才便是例证。此时的游士们依然保持着战国时的观念，趋利择主，只对自己的主公负责。直到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弱化诸侯之后，士人们才多为中央朝廷所用。

此时的诸侯国已经不再是先秦时的诸侯国，西汉中央也不再是式微的周王室，因此这种人才的流散只是暂时的。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论及这一段时指出：「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断定汉初还是战国游士时代的延长。事实上，秦的统一

<sup>70</sup> 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下册，页 721。

<sup>71</sup> 孔令广，〈试论西汉初士人流向诸侯之原因〉，《传承》，2008 年第 8 期，页 78-79。

确已结束了古代的游士时代。不过由于社会史不能像政治史那样有清楚的断代，所以汉初几十年之内游士又一度回光返照而已。」并指出秦汉之后，由于「士族化」与「恒产化」，游士向有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转变。<sup>72</sup>

春秋战国时为诸侯带来利益的流动人才，在大一统的朝代则成为了社会稳定的威胁。因此，像春秋战国时可自由选择其出仕地的「游士」在后世便难得一见了。但与之相反的、为加强中央集权而生的「科举」与「异地为官」制度，却达到了与此相似的效果。

科举作为中央选拔全国人才的考试机制，促成了士子纷纷向首都流动。而接下来的「异地为官」政策（或「易地为官」，也可称之为「地域回避」），则又强迫这些人离开自己故乡去出仕。当然，异地为官政策与科举并不是配套的，也不是同时产生。异地为官制的演变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sup>73</sup>西汉汉武帝时为抑制地方豪强，就已经开始推行异地为官政策。随着西汉到东汉社会的逐渐发展，这一政策由模糊的传统变为了清晰的制度。<sup>74</sup>最初这些全国分派的官员是以察举制来选拔的，但察举制依然可以助长地方宗室的势力。隋唐确立的科举，才真正有助于异地为官制度的发展，科举选拔真正打破了家族势力，选官的权力全部收归中央，提供了足够流通全国的人才，异地为官制度才得以更为广泛和严格地实行。唐朝的《回避条例》不许官吏任职本贯州县官及本贯邻县官。明太祖朱元璋则将全国分成三大任职区，实行「南北更调」制，即北人官南，南人官北。清朝的回避制度则更为彻底。<sup>75</sup>从汉到清，回避范围越来越大，规定也越来越严

---

<sup>72</sup>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页 51-52。

<sup>73</sup> 胡萧力，〈从「地域回避」到「利益回避」——国家治理中地方主官异地任职制度检讨〉，《中外法学》，2016 年第 3 期，页 593-612。

<sup>74</sup> 唐昊，〈古代异地为官制度利与弊〉，《人民论坛》，2015 年第 10 期，页 78-80。

<sup>75</sup> 唐昊，〈古代异地为官制度利与弊〉，页 78-80。

格。分派到异乡为官后，还要频频调换，使官员在各地之间任职流动。这些政策虽然造成了一定的社会管理问题（如新官不熟悉风土民情、短任期无法专心做大事等），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像春秋战国时的游士一样，打破了血缘与地缘的桎梏，促进了地域间、阶层间的，整个社会内部的交流，也带动了文化的流通、促进了各区域间整体认同的加强。

## 六·华夏观的分析

### （一）何为华夏

#### 1. 姬姓为华夏？

《荀子·儒效》中提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sup>76</sup>华夏，狭义来讲，是周王室与诸夏相加，核心是诸姬姓国。诸夏内部的「同异」，基本是用是否亲近姬姓国的道义来划分的，即是否「同心」。如《左传·襄公》有载「其弃诸姬，亦可知也已。诸姬是弃，其谁归之？吉也闻之，弃同即异，是谓离德。」<sup>77</sup>

在早期，出仕他国者，基本也都是去姬姓国家或姜姓国家。但这一点从春秋后期开始已经发生变化。去吴越者有之，如孙武，去楚国者则更多，就连孔子这样周礼的倡导者，也是想去楚国的。战国时期，则入秦楚者数不胜数。

可以说，姬姓是周的国姓，是周的核心，但华夏的范围，既有亲戚诸侯国姜

---

<sup>76</sup> 荀子著，方勇、李波译注，《荀子·儒效》（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 90。

<sup>77</sup> 左丘明著，陈书良审定，《春秋左传》，页 533。

姓国，又有继承分封夏商旧族的诸国如妘姓国、姁姓国、子姓国等，还有由「蛮夷」过渡到华夏领域中的嬴姓秦国与芈姓楚国等。士人在出仕他国时并不以姬姓为第一依据，也并不以姬姓国为边界范围。

此外，虽然周的国姓是姬姓，周内部也以姬姓国为核心，但周的外部同样也存在大量的姬姓国。李零指出：「戎狄颇有姬姓者，如陕西有骊戎（也叫丽土之狄），山西有大戎，河北有属于白狄的猷虞、肥、鼓、中山，它们都是姬姓的戎狄。周人本身，可能也是姬姓戎狄的一支」。<sup>78</sup>这些外部姬姓国家完全不在士人出仕的考虑范围内了。

## 2. 中原为华夏？农业社会为华夏？

中原族群，即相对于边缘族群的地理位置位于中心的核心族群。从士人出仕的情况来看，文化相差较大的边缘族群依然是华夏的边缘，但出仕范围已经不再限于中原。由于秦楚吴越等国的华夏化，这个边界继续向外扩大。

距离中心远、地处「夷地」，拥有「夷民」的边缘国家，自然会被中原具有心理优越感的诸侯国视为夷狄与可以光明正大征伐的对象。但从士人看来，显然不这么认为。边缘国家的机会更多，因此他们反而愿意离开自己地处核心的父母之邦，来到遥远的秦楚吴越。这说明针对夷狄的华夏观——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是中原各诸侯国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如强调自己的身份、获得军事上的道义合理性、与争取更高功绩）时打出的口号。而实际上，这些国家早已纳入华夏范畴，是游士们钟爱选择的邦国。

农业与牧业的区分则与华夏观的形成相辅相成。周人往往以生活方式来区分

---

<sup>78</sup> 李零，《茫茫禹迹》，页 96。

与外界的不同，周人在讲述起源故事的时候，总是强调两点——从事农业与筑城定居，用这两点来划定与戎狄族群的边界。<sup>79</sup>从社会主体上讲，周与边缘族群的区别确实是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区别，气候变冷使边缘族群牧业化，而华夏认同的其中一种功能，也正是利于其内部的农业人群维护共同资源。被排除在外的边缘族群则进一步游牧化。<sup>80</sup>但被称为戎狄的族群及国家也有行农业、筑城郭者，并非截然的差别。

### 3. 夏王朝旧地、夏旧族为夏？周分封国为华夏？

夏名称的来源是夏朝，周王室自诩为夏的后裔，其同姓国皆称为「诸夏」也是由此而来。地域上，比照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夏时期全图与战国时期全图，可知其中心始终是在黄河流域下游，<sup>81</sup>然而春秋战国时期华夏的版图在夏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大幅发展，春秋时，华夏已包括西方秦国的广大领土，并向南发展到长江流域以北，<sup>82</sup>战国时期则继续扩张，基本把长江流域下游即楚国兼并的大片土地囊括其中。

族群上，西周的分封已经使人口重组，在新的地缘范围内，夏、商与周的人民进一步融合，形成的新的华夏族，即是融合了这三族的新的民族。许倬云在《西周史》中提到：「至于各封建诸侯间的联系，颇赖祭祀（同姓）与婚姻（异姓）。终于在这个秩序的基础上凝结了一个强烈的『自群』意识，后世的华夏观念，当

---

<sup>79</sup>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页 212。

<sup>80</sup>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页 14。

<sup>81</sup>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香港：三联书店，1991）页 9-10 与 页 31-32。

<sup>82</sup>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页 20-21。



由周初族群结合而开其端倪。」<sup>83</sup>

至于分封国为华夏，的确是较为传统的观念。正如《左传·昭公》所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sup>84</sup> 因此，士人不论在哪个诸侯国出仕，都是在周天子的土地上、为周天子的士人。这里说的诸侯国，是指经由周天子分封的国家，即拥有周王室承认的「合理性」国家。中原姬姓国自然是周初即分封的最原始与核心的封国，秦楚虽晚，但也分别在周平王与周成王时期得到了承认。<sup>85</sup>

#### 4. 周礼的统治区域？礼仪之邦为华夏？

相比而言，可以说，文化才是更适合界定华夏的标签。士人依照文化上的华夏观流动各国，同时他们的出仕也促成、强化、完整了华夏观。

钱穆在《中国文化导论》第三章〈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中曾提到：「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sup>86</sup>

邢义田也指出「周人对中国天下观的贡献并不在延续这些殷商以来颇为机

---

<sup>83</sup> 许倬云，《西周史》，页 158。

<sup>84</sup> 左丘明著，陈书良审定，《春秋左传》，页 692。

<sup>85</sup> 按《史记》中〈秦本纪〉与〈楚世家〉所载，楚是在周成王时「封以子男之田」；秦则曲折得多，周宣王时秦仲为大夫，为周诛西戎而死于戎，其后破西戎有功，周宣王才封秦为「西垂大夫」，而直到西周灭亡平王迁都，秦襄公护周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秦与楚的封地都是「蛮夷戎狄之地」。

<sup>86</sup> 钱穆，《中国文化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页 41。

械的方位和层次观念，而在孕育出一种文化的天下观。」<sup>87</sup>

葛兆光进而认为「这种观念多少给中国古代人的世界想象，带来一些弹性空间，使他们不至于为了异族的崛起或异文明的进入而感到心理震撼，可以从容地用『礼失求诸野』、『乘桴浮于海』、『子欲居九夷』等等说法，宽慰自己的紧张。」

88

可见，华夏是一个边界并不十分分明的、持续增长的文化版图。原理上讲「周礼」、过农业文明生活的，便都可以纳入华夏。

## （二）华夏的边界

### 1. 华夏与蛮夷戎狄

王明珂认为，想要研究一种事物，就要研究它的边界，正是华夏的边界使其成为华夏。春秋战国的人们在提到华夏一词时，多是为了和「蛮夷戎狄」并列。那么，华夏的边界是否是周边异族呢？

蛮夷戎狄四字在后世都成为了一种蔑称，但其最初产生时，却未必就带有歧视性质。李零在《茫茫禹迹》一书中提到：「夷」是象形的东方之人，「蛮」可能是音译，「戎」是军事之意，「狄」可能也是音译。<sup>89</sup> 邢义田也在《秦汉史论稿》中提出「（北狄、南蛮、东夷、西戎）这种固定的搭配应该是战国时人根据战国以降的实态，将天下秩序概念化和规则化以后的结果。」<sup>90</sup> 可见，对「蛮夷戎狄」

---

<sup>87</sup> 邢义田，《秦汉史论稿》，页 19。

<sup>88</sup> 葛兆光，《宅兹中国》，页 46。

<sup>89</sup> 李零，《茫茫禹迹》，页 48-50。

<sup>90</sup> 邢义田，《秦汉史论稿》，页 24。

的刻板印象是到战国时才逐渐形成。

春秋战国之时的蛮夷国家，并非都像时人提到时一概而论的文化落后，东夷国君郟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虽为夷国之君，但同晋国国君谈起少昊氏「以鸟名官」的来历，使得孔子都不得不过来向他请教，「仲尼闻之，见于郟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sup>91</sup>此外还有姜戎首领驹支，李学勤在《春秋史与春秋文明》中讲过一段故事：「公元前 559 年，晋国范宣子指责姜戎首领驹支，不让他参加盟会，甚至扬言要逮捕他。驹支进行了义正词严的辩驳，最后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贄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说毕，『赋〈青蝇〉而退』。〈青蝇〉是《诗经·小雅》篇名，其中有『恺悌君子，无信谗言』二句，驹支以此讽刺范宣子受人挑拨，轻信谗言。范宣子自觉失言，只好向他赔礼道歉，让他参加盟会，以顾全自己『恺悌君子』的名声。」<sup>92</sup>

蛮夷戎狄与诸夏并非种族上的天然区别，《荀子·儒效》中便说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sup>93</sup>而他们通过文化的转变，是可以成为「华夏」一员的。王柯在《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中便指出：「很显然，先秦时代的中国人在将蛮、夷、戎、狄与『中国』加以区别时，并非像当代的文化人类学那样，认识到『拥有共同的生活地域、语言、历史、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共同体意识』是构成民族集团的重要条件。他们所注重的只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行动方式和价值观，把着眼点完全放在了文化的差异上。」<sup>94</sup>

---

<sup>91</sup> 左丘明著，陈书良审定，《春秋左传》，页 718。

<sup>92</sup> 李学勤，《春秋史与春秋文明》，页 198。

<sup>93</sup> 荀子著，方勇、李波译注，《荀子·儒效》，页 111。

<sup>94</sup> 王柯，《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台北：政大出版社，2014），页 31。

如《礼记·王制》一篇中便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sup>95</sup>这一区分，显然是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并无族群间相互敌视之意。

李大龙在援引这一段文献时也论述道：「『五方之民』划分的依据主要是物质文化特点的不同，而不是人种或血缘方面的原因……因此，与其说『五方之民』是对民族的区分，还不如说是对不同的区域文化的划分」。<sup>96</sup>

李零把华夷之间的变化形容为一种文化漩涡：「吸进去是华夏，甩出来是夷狄」。<sup>97</sup>像秦楚吴越，就是被吸纳进去成为华夏，而杞国等，则是被甩出来成为夷狄。如李学勤所说：「如杞君朝鲁君，用夷礼，于是杞被贬为夷；后来杞国朝鲁用周礼，杞又得道，被称为诸夏」。<sup>98</sup>当然，李零所描述的「华夏化」与「胡化」过程未免被动了些。因仰慕或需要中原先进文化来强国而主动「华夏化」的「蛮夷」国家当不在少数，中原国家「胡化」也是有所考虑的。

史料中时人对于这一「胡化」议论的最标志事件，便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臣子们对胡服的反对，可谓激烈。公子成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反对者：「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

---

<sup>95</sup> 丁鼎，《礼记解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页190。

<sup>96</sup> 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页1-14。

<sup>97</sup> 李零，《茫茫禹迹》，页24。

<sup>98</sup> 李学勤，《春秋史与春秋文明》，页200。

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人道，逆人之心，而佛学者，离中国，故臣原王图之也。」其他臣子如赵文、赵造、周绍、赵俊等也极力反对，后经赵武灵王审时度势的一番劝导才终于同意。<sup>99</sup>这说明以华夏文化（或文中的「中国」）是以先进文化自诩的，哪怕是处于北境且非姬姓的赵国，也深怀「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的观念，觉得向胡人学习便是退步。这也是文化优越感的一个典型体现。

区分固然是存在的，但并不是彻底的。区分主要是为了划分「内外」，而非彻底隔绝。像墨子这样提倡各国平等人人兼爱的学者毕竟是少数，主体思想还是由中心向四周的层叠关系，因此是要有亲疏等级序列的。等级也是礼法的一部分。如《春秋公羊传》解释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sup>100</sup>是说礼法要由近及远推广。但因为春秋战国已渐次成为「礼崩乐坏」的时代，最初设计好的规矩和等级已被实力的争夺打破，处在礼法规定边缘的强国，自然不能再被礼法约束。中原的诸侯国们也不能因为其原本地位的崇高而一直享受安逸。

华夏不断在更新，在容纳。由于一部分原本异族的华夏化，异族的观念重新定义并持续向外部推移，<sup>101</sup>华夏的边界也随之扩大。士人们也在不断适应新的局面，他们已经认同了走在华夏化前沿的夷狄强国。出仕这些「新华夏国家」已经不会受到多少道义上的制约，礼法的解释也随着时代不断在变化。血缘的正统逐渐为文化的正统所取代，边缘诸侯国们借此扳回局面，正式称霸华夏。

与后世的「夷夏之辨」（尤其宋时）相比，此时的夷夏分别可谓柔和宽容了。

---

<sup>99</sup> 司马迁，《史记赵世家》，上册，页 333-335。

<sup>100</sup> 黄铭、曾亦译注，《春秋公羊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页 504。

<sup>101</sup>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页 14。

大概是因为边缘民族对中原的威胁、冲击，都不至使中原各国奋起划定一个明确决绝的界限，依然是敞开的态度。「柔远能迩」依然是指导思想，对边界的不关注也是文化骄傲的一种体现——四周皆是「蛮荒之地」，不需深入了解，周天子或有德行的诸侯在中原做好教化，蛮夷自当远来宾服。而当秦楚对中原诸国的命运造成生死攸关影响时，他们早已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了。

但同时要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在已经逐渐「华夏化」的秦楚吴越以外，仍有始终不向中原文化发展、且持久对华夏诸国造成武力威胁的「蛮戎夷狄」。秦、赵、燕长城外的匈奴便是其一。如果说秦楚吴越是周的「软边界」（其性质可能转变，边界可能转化为内里），则这些始终不可华夏化的外族便是「硬边界」。这些「未曾开化」的族群时时侵犯农耕文明的边境。对更外圈族群的防范与自卫，同时也加强了内圈原本也有许多差别的国家的互相认同与接纳。

## 2. 华夏与天下

周以「夏」的名号立国，并创造了「禹迹」与「九州」的概念。大概是为了从道理上说明，自己是夏族的后裔，推翻商后，便理所应当继承并扩展夏的疆域，而夏的开国君主禹便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了。传说他曾游历九州、铸九鼎以示各州风土民情，于是「禹迹」的「九州」，就基本成了当时被普遍认同的「天下」。战国时魏人又托大禹之名，作《禹贡》，对九州的自然和人文地理都做了描述。

「天下」之名听起来虽大，细究起来却很空泛。那时虽有《山海经》等对域外描写的书籍，但多是想象。不管是《山海经》中的海外诸地，还是邹衍的大九州构想，都远远超出了人们脚步可及与可见的范围，因此时人对地理知识的了解

其实是很贫乏的。邹衍的大九州虽大，却几乎都是抽象的。他认为天下有八十一州，中国居于其中一州，名为「赤县神州」。但究其实质，依然只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的畿服制度层级推想的延伸。从居中的王，到一层一层的臣子诸侯，再到蛮夷戎狄，其外便是理想化而相似的推演了。就像由小到大的方形框子，从中间延伸到无穷，而越外层，就越模糊，越不可控制。<sup>102</sup>西汉《淮南子》的「墮形训」还在这个基础上向外推演。这种理论中「华夏」居于「天下」正中，但「天下」似乎只装了个「华夏」。这大概是因为此时的中国（或者说周人）并未遇见过同等的外界文明。

虽然这样的「天下观」是理想化的，但不论是《山海经》中亦神话亦地理的描述、夏禹九鼎的传说、对分散在各诸侯国内的「岳镇海渚」的祭拜，还是东周亦真亦幻塑造的一些「共同记忆」，都造就了当时人们较为固定的整体的世界观。这些带着神话色彩的概念，加上周初分封的谱系与周公制定的礼法，加以血缘与家族的脉络聚拢，便共同形成了一个华夏的概念。即使周王室名存实亡，已经无力控制诸侯，诸侯国内亦政治混乱，显示出一个分崩离析、弱肉强食的无政府秩序状态，但观念中的统一仍然存在。这种观念就像「母大陆」一般。在中国文明形成的这个东亚单元格内，先秦时并没有其他文明足以和华夏文明争锋，因此，先秦中国人所谓的天下，便是一体，便是华夏的模糊边界。这个天下是由周天子、王室大臣、诸夏与蛮夷组成的。最先进的文化，就是中心的周的文化，因此把它称为「夏」，再誉为「华夏」，四周的文明则渐趋落后。圣人的理想，是想要「一乎天下」，即可以达到的这个天下的范围内，都要通过教化使其统一。

这便与希腊城邦、欧洲封建不同了，他们缺少这种「统一」的认知，便没有

---

<sup>102</sup> 葛兆光将其喻为由中心向外延伸的棋盘或回字形。葛兆光，《宅兹中国》，页 44。

这种天然向心力。春秋战国的诸侯林立，只是一种过渡状态，因为有超出各小国的「华夏观」与「天下观」，因此这种分裂局面早晚会结束，一统的时代早晚会来临，而且会成为常态。

《韩非子·说林上》中就记载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温人之周，周不纳客，问之曰：「客耶？」对曰：「主人。」问其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问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谓非客，何也？」对曰：「臣少也诵《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则我天子之臣也。岂有为人之臣而又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sup>103</sup>

因此，有着这种「天下观」的士人们出仕诸夏与「夷狄国家」也就不足为奇。天下一体的观念使他们自有更大的追求，只要他们是在「天下」间实行推行德政、施展抱负，便是正道。

### （三）各诸侯国对整体性的认知

#### 1. 中原各国

虽然周与前朝并无本质不同，都是联盟式小国组成大国的构造，但许倬云指出：周时的各诸侯国已有「我为诸夏」、是整体夏的一部分的概念，而商是没有的。<sup>104</sup>或者说，至少从现有考古资料中观察，商的这种意识并未有明确表达。也许夏商时期就已经存在有某种程度的整体意识（考虑到周的华夏意识不可能凭空

---

<sup>103</sup> 韩非著，贾太宏译注，《韩非子通释》，页 183。

<sup>104</sup> 许倬云，《西周史》，页 138。「周人与东土的部族糅合成为一个文化体系与政治秩序下的国族。殷商自称大邑，却无『华夏』的观念。这些周王国内的各封国，自号华夏，成为当时的主干民族。」



产生，这一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因为语言与存世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明确得知这种意识。但周建立在夏商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了各族，至少应是极大地发展了这种整体认同。因此周人更有一种团结的向心力，即使大家长周王室式微，原属于一家的兄弟邦国也应该更亲近，相互扶持、帮助。<sup>105</sup>诸夏内哪国有难，也是要出力相助的。甚至于哪国被灭了，其他国家也该助其重建。「同姓之国」、「甥舅之国」、「兄弟之国」，似乎是诸夏之间政治上的核心关系。

「同姓之国」的影响是较大的。根据大数据对比显示，姬姓国之间的战争数量还是远远少于姬姓国与蛮夷国间的战争数量的。<sup>106</sup>同姓国与非同姓国的亲疏关系，依然比较明显。例如晋国与楚国作战（起因是晋国趁楚国灾年想要攻之谋利），结果晋国战败、国君夷吾被俘，「周天子闻之，曰『晋我同姓』，为请晋君」。<sup>107</sup>晋重耳逃亡时路过曹国，曹公曾对他无礼，曹大夫厘负羁劝谏说：「晋公子贤，又同姓，穷来过我，柰何不礼！」然而曹公不听。<sup>108</sup>重耳上位后伐曹且虏曹共公归，也有人劝谏他说「昔齐桓公会诸侯，复异姓；今君囚曹君，灭同姓，何以令于诸侯？」他便放了曹公。<sup>109</sup>晋假虞道灭虢之时，虞君便因「晋我同姓，不宜伐我。」不听宫之奇唇亡齿寒的劝告，深信晋不会攻打他。<sup>110</sup>也有同姓国间征伐的，史书便会特意记上一笔并予以批评，比如卫灭邢。<sup>111</sup>

姬姓国常称与齐国的关系为「甥舅之国」，概因齐为姜姓最大国，而姬姜世代通婚。比如《左传·成公二年》便载有：「夫齐，甥舅之国也，而大师之后也」。

<sup>105</sup> 如管仲言「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丘明著，陈书良审定，《春秋左传》，页 96。

<sup>106</sup> 王日华、漆海霞，〈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相关性统计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13 年第 1 期，页 103-120。

<sup>107</sup>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上册，页 40。

<sup>108</sup> 司马迁，《史记·晋世家》，上册，页 281。

<sup>109</sup> 司马迁，《史记·管蔡世家》，上册，页 253。

<sup>110</sup> 司马迁，《史记·晋世家》，上册，页 277。

<sup>111</sup> 左丘明著，陈书良审定，《春秋左传》，页 178。「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同姓也，故名。」

「兄弟之国」也常见于先秦史书，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人向鲁君言吴起胜卫之不可取时便说：「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sup>113</sup>《左传·昭公十三年》中鲁国也派叔向对晋国说：「君信蛮夷之诉，以绝兄弟之国，弃周公之后」。<sup>114</sup>《韩非子·说林下》中记载韩赵魏的故事则更为典型，「韩、赵相与为难。韩子索兵于魏，曰：『愿借师以伐赵。』魏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不可以从。』赵又索兵以攻韩。文侯曰：『寡人与韩兄弟，不敢从。』二国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构于已，乃皆朝魏。」<sup>115</sup>「兄弟之国」这一概念产生时应与「同姓之国」相近，后来则更多是后期战略上交好的国家，而非「甥舅」、「同姓宗国」那样本于血缘。

这是国与国之间的规则、外交策略，但从士人出仕来看，未见有以国家的亲疏作为出仕国选择的等级顺序者，还是以国力强弱与政策作为主要的选择依据。姬姓国虽血缘地位高，但春秋战国时多为小国，实力远不及大国，机会也就相应少了很多，因此并不是士人们的「热门」去处。另外，虽然春秋到战国，诸侯国之间征伐越来越频繁，至于同姓之国相争、兄弟之国相害，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定的，几年前晋救郑击楚，几年后又是晋伐郑、楚救郑。<sup>116</sup>可谓瞬息万变，因此没有固定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没有长久的「友邦」或「敌国」，因此也就没有固定的偏爱与仇恨、固定的「敌我关系」，所以一国士人也少有因本国与别国的关系而选择出仕国家的概念（当然，某一时间段进入某国的可行性、利

<sup>112</sup> 左丘明著，陈书良审定，《春秋左传》，页 340。

<sup>113</sup> 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下册，页 451。

<sup>114</sup> 左丘明著，陈书良审定，《春秋左传》，页 710。

<sup>115</sup> 韩非著、贾太宏译注，《韩非子通释》，页 210。

<sup>116</sup>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上册，页 296。

益，也要或多或少受到两国关系的影响)。

## 2. 蛮夷国家变成华夏国家后的自居

在这一变化中，楚国是最典型的一个。周夷王时，王室式微，楚熊渠曾表示：「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遂立子为王，后因畏周厉王的暴虐而去掉王称。后来楚武王时期又急于争位，「三十五年，楚伐随。是也。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於是始开濮地而有之」。<sup>117</sup>还完全是以蛮夷自居、骄横不礼中原的国家。

至楚成王时，始结交诸侯、上献天子，受到天子的一定认可，并礼待出奔的晋重耳与齐桓公七子。至楚庄王时，则已可因义复立陈国而未吞并，战败郑而未灭之，围宋亦为道义罢兵，显然此时楚庄王对其名节、声望的看重已经超出了对吞并诸侯国的欲望，已经超越了「蛮夷国家」的思维。而当潘党建议楚庄王收晋尸筑为「京观」，以彰显武功时，楚庄王说：「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辅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

---

<sup>117</sup>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上册，页 293-294。

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官，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何以为京观乎？」<sup>118</sup>表现出他已经会用华夏的礼法思维、华夏的文化来思考（或至少以华夏君主的说辞来美化自身形象）。且楚庄王的大夫亶已经说出「若民烦，可教训。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这样的话，<sup>119</sup>即是与蛮夷戎狄划界，而自命为「中国」了。

显然，楚国从行为与自我认定上，都一步步靠近华夏。秦国在史料记载中没有像楚一样鲜明的变化，也许是因为秦国在文化上并不如楚国对中原造成威胁、行事也不如楚国野蛮，因此前期并未遭到中原对楚国那样的频繁贬低。但从考古资料上，也能发现其逐渐以夏自居。李零在〈中国古代地理的大视野〉一文中提及：「（秦）这个国家，不但其贵族本来和山东境内或淮水流域的夷人是一家，而且族众也是西戎土著，一直到战国中期的秦孝公时仍很落后，『僻在雍州，不与中国之会盟，夷狄视之』（《史记·秦本纪》），但有趣的是，就连他们也是以『夏』自居。证据有二，一是上面提到的秦公簋，二是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后者涉及秦的归化制度（即现在的移民法），规定秦的原住民叫『夏』，归化民叫『真』，只有母亲是秦人，孩子才算『夏子』，如果母亲不是秦人或出生于外国则只能叫『真』不能叫『夏』」。<sup>120</sup>可见，秦也逐渐把自己视为华夏正统国家了。其由最开始的偏远落后，到文化渐趋先进、投奔秦国的土人越来越多，也可显示一二。

---

<sup>118</sup> 左丘明著，陈书良审定，《春秋左传》，页 286。

<sup>119</sup> 左丘明著，陈桐生译，《国语·楚语》，页 328。

<sup>120</sup> 李零，〈中国古代地理的大视野〉，收入李零，《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页 255-269。

## 七·结论

综上所述，华夏观是一个规则确定、而范围可不停变动的华夏族群自我整体观念。春秋战国时的华夏观，与其说是国家观、民族观，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观，再具体一点，是一种「文化优越观」。先秦的华夏族群以「最先进文明」作为自己的标签、甚至疆域。人们以华夏文化自居、靠这种优越意识团结，共尊名义上的周王室，持续同化周边，不断互相融合交流，并与文化相差大的族群划界，形成华夏观。实行「周礼」的区域，都可以是「华夏」。在每一个时间截点，华夏都有其相对疆域，但纵观春秋战国历史，华夏的疆域范围却始终在变化。

从西周到东周，礼法的华夏观渐渐褪色，从中心向四周渐次疏远的周天子层级规则被打破，纯文化的华夏观渐趋形成，部分西周时还处在华夏边缘上的族群，到春秋战国时已成为华夏主要国家。「夷」「夏」有别，但「夷」可为「夏」，地缘与血缘上的亲疏远近不会永远影响一个诸侯国在华夏中的地位，华夏与外部族群也并没有先天的截然区别。诸夏原本就是已经结合了原夏商周民族的混合体，又不断向外容纳新的「外族」，使得其范围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庞杂。

华夏观所确立的「华夏」的血缘地缘概念，已基本形成「华夏族」——后世「汉族」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笼统的整体认同已经较为完善，而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则是由秦汉通过集权手段完成。

华夏观是各诸侯国理念中超越了其本身的更大整体的认同，这个观念不论周王室兴衰始终存在。使得分裂时期，人们心中依然深埋「大一统」的种子。正是在春秋战国这一混乱的、诸侯国林立的时期，逐渐孕育出中国国家的形态。在后世的两千多年中，这一形态始终没有大的变化，即使经历过汉族或非汉族的不同

政府，其文化内核、文化认同始终完整而少有改变。这也正是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大一统时代远多于分裂时期的基因所在。

与西方学者们争论不休的民族定义相比，华夏观是一个更主观的概念。建立在文化尤其是共同记忆、思维方式、生活习俗、信仰、价值观等的基础上。虽也有农业与牧业生产生活方式等客观的区分，但这些客观因素并非不可改变。

周天子的名存实亡，诸侯国的割据与竞争，造就了文化的繁荣与自由。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频繁出仕各国，渐趋成为一种正当而普遍的行为。士人的行动并不囿于母邦，母邦之外，还有诸夏，诸夏之上，还有天下。而天下，是以「礼法」为普世规则的抽象范围。士人出仕所选择的范围，主要是一个文化版图，被容纳入华夏文明的诸侯国，都可从而仕之。此范围内诸侯国对士人的吸引力，并不以其分封时的地位等级为序，士人的选择主要基于对出仕国机遇、政策与礼待的考虑。即使并未完全纳入华夏文明的边缘国家，也可以通过改造使其遵循周礼、接受中原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制度。「以夏变夷」，这是春秋战国士人尤其是怀有使命感的学者们十分认可的。

士人的流动，一方面顺应着华夏观，一方面也扩写着华夏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的人才争夺战进一步淡化了国与国之间的区别，随着士人的各国间出仕、各国任职士人的更换，整个华夏社会的观念、认知渐趋一致。春秋战国鼎盛的士人流动之后，即使是大一统国家时期，人才的流动仍在继续——虽然由春秋战国时期主动的游仕变为后世政府强制的异地为官——始终促进着社会资源的流动。人才流动的地理范围也基本相同，虽然这范围的属性从理想中的华夏变为了实体的统一国家。它使得中国广袤疆域之间，地缘与血缘的控制不断被打破。一边强化着王权，一边沟通着九州，能人志士在华夏大地上流转不息。

## 参考文献

(以下按拼音顺序)

### 一、参考古籍

韩非著，贾太宏译注，《韩非子通释》。北京：西苑出版社，2015。

黄铭、曾亦译注，《春秋公羊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

孔子著，杨伯峻、杨逢彬注译，《论语》。长沙市：岳麓书社，2000。

刘向著，汤以澧校，《说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孟子著，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孟子》。长沙：岳麓书社，2000。

墨子著，孙以楷、甄长松译注，《墨子全译》。成都：巴蜀书社，2000。

司马迁，《史记》。长沙：岳麓书社，2017。

王充著，《论衡》。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荀子著，方勇、李波译注，《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11。

左丘明著，陈书良审定，《春秋左传》。乌鲁木齐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左丘明著，陈桐生译，《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4。

### 二、中文专书及译著

丁鼎，《礼记解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

葛兆光等，《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中国：中华书局，2016。

葛兆光，《宅兹中国》。台北：联经出版社，2011。

- 宫崎市定著，焦堃、瞿柘如译，《宫崎市定中国史》。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 李零，《茫茫禹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 历史研究编辑部，《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 李学勤，《春秋史与春秋文明》。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
-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香港：三联书店，1991。
- 田继周，《先秦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 王柯，《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台北：政大出版社，2014。
-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市：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
-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国：中华书局，2009。
- 邢义田，《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
- 许倬云，《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 三、英文专书

-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ism*. Malden, USA. :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1.
-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四、期刊论文



陈荣庆、龚艳芳，〈试论战国士人的俸禄变化与战国学术兴盛〉，《北方论丛》，2007年第2期，页72-75。

陈筱芳，〈春秋华夷关系以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页34-40。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页1-19。

胡萧力，〈从“地域回避”到“利益回避”——国家治理中地方主官异地任职制度检讨〉，《中外法学》，2016年第3期，页593-612。

孔令广，〈试论西汉初士人流向诸侯之原因〉，《传承》，2008年第8期，页78-79。

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页1-14。

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页4-189。

李渊，〈《左传》中的楚庄王事迹与楚人的华夏认同意识〉，《文学史研究》，2017年第1期，页1-8。

梁葆莉，〈吴国华夏化的精神历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页91-95。

齐秀生，〈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流动述略〉，《齐鲁学刊》，2006年第2期，页42-46。

秦永洲，〈春秋战国的华夷之辨与华夏正统之争〉，《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页68-70。

桑东辉，〈也谈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是否为主权国家——以《墨子》为例、以国际法为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页137-149。

- 唐昊，〈古代异地为官制度利与弊〉，《人民论坛》，2015年第10期，页78-80。
- 王日华，〈道义观念与国际体系的变迁——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国际观察》，2009年第1期，页54-60。
- 王日华、漆海霞，〈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相关性统计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页103-120。
- 辛万翔，〈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和国际关系〉，《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页138-142。
- 徐杰令，〈论春秋时期的「出奔」〉，《史学集刊》，2000年第2期，页76-81。
- 袁礼华，〈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游说拜官〉，《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4年第1期，页92-97。
- 张富祥，〈先秦华夏史观的变迁〉，《文史哲》，2013年第1期，页22-38。

## 五、硕博论文

- 时海静，〈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国人才研究〉。湖北：华中师范大学，2011。
- 孙赫，〈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人才引进〉。吉林：吉林大学，2011。